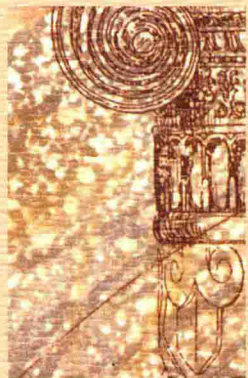


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of the League of Leftist Writers: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 左联筹建与组织 系统考论

张广海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 左联筹建与组织 系统考论

张广海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左联筹建与组织系统考论 / 张广海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308-18893-7

I. ①左…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史料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303444 号

## 左联筹建与组织系统考论

张广海 著

---

责任编辑 陈佩钰(yukin\_chen@zju.edu.cn)

责任校对 杨利军 夏斯斯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8893-7

定 价 59.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com>

# 目 录

导 论 左联研究的现状及突破的可能	1
一、偏重组织史的左联研究综述	1
二、左联组织史研究的可能性	7
第一章 左联筹建的政治宣传动因	11
一、批判“假马克思主义”	
——左联筹建的直接动因	12
二、从左联报刊看左联前期的批判主旨	18
第二章 鲁迅何以加入左联及其与早期左联之关系	29
一、“革命文学”论争之外	
——鲁迅与中共发生关系的另两条线索	30
二、鲁迅与革命文学家结盟考	45
三、风起于青萍之末	
——鲁迅与早期左联盟员之关系	56
第三章 左联成立前中共的文化组织实践	63
一、回忆录中的早期知识分子支部建设	64

二、文化党团和文化工作者支部的建立·····	68
三、上海闸北区早期知识分子支部变迁考辨·····	71
四、知识分子支部向街道支部的转变·····	77
<b>第四章 左联筹备及其领导机关</b> ·····	85
一、左联筹备及其小组·····	85
附：左联是在1929年冬成立的吗？	
——对冯润璋回忆的辨析·····	94
二、文委·····	97
三、文总·····	108
<b>第五章 左联组织系统演变考述</b> ·····	113
一、左联行政系统及研究部门·····	113
二、左联党团·····	122
三、左联组织机构及相关人员递变汇考·····	127
<b>结 语</b> ·····	139
<b>附 录 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大事年表(1927—1931)</b> ·····	144
<b>参考文献</b> ·····	172
<b>索 引</b> ·····	184
<b>后 记</b> ·····	192

# 导 论 左联研究的现状及突破的可能

## 一、偏重组织史的左联研究综述

左联研究一度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镇,且拥有专门的研究机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sup>①</sup>然而,左联研究的冷热起伏也十分显著。民国时李何林即开始着意搜集整理左联资料,并用唯物史观的眼光加以批评阐释,所持立场与鲁迅相近。<sup>②</sup>相关文学史著也多半会论及左联,但多是对左联文学活动、文学主张的概要介绍。总体来看,对左联的评价倾向于肯定和赞扬,但对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评价,则有逐渐降低的趋势。<sup>③</sup>新中国成立后相关研究和史料整理工作进一步拓展。左联自然也成为文学史的重要论述对象,鲁迅所代表的左联一翼,获得高度关注。20世纪60年代初,涌现出左联研究的一次高潮。一方面是对左联文学和思想

---

① 本书所讨论的“左联”,仅限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上海总部,不涉及左联各地分盟。

② 李何林编:《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上海:生活书店,1939年。

③ 比如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杰成印书局,1933年;王丰园编著:《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北平:新新学社,1935年;李一鸣:《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上海:世界书局,1943年。这几部文学史著,都对左联设有专门章节。

的探讨,如南京大学中文系编辑出版了论文集《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sup>①</sup>;另一方面,为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如丁景唐、瞿光熙编有《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sup>②</sup>,上海文艺出版社组织人力整理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重印了20种左联刊物及近20种同期其他革命文化刊物,保存了大批左联资料。但政治斗争和文坛风向的不断变动已经对研究产生深入影响。“文革”时,左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产物,研究自然停滞;但此一时期各种革命组织对“黑线”的深挖及对相关当事人频繁的内查外调,仍为后来的研究留下了诸多材料。比如近年披露的《冯雪峰外调材料》,便包含不少左联回忆资料。<sup>③</sup>可惜这类材料,目前可以利用者还不多。“文革”后,已届高龄的左联盟员纷纷发表回忆文章还原历史,有力带动了研究兴起。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在史实辑考和理论溯源等方面有突出成绩,如丁景唐、瞿光熙、陈漱渝、周国伟、朱正、陈子善等对左联盟员和组织的考察,张大明和艾晓明等对左联理论资源的发掘等。此一时期还出版了多部侧重左联研究的论文集。<sup>④</sup>虽然此时段的研究对象多为宽泛的30年代左翼文学,而相对较少左联专项研究,但因廓清了左联的基本轮廓,仍堪称奠定了左联研究的基础。港台学者也有突出贡献。香港学者王宏志以左联的组织结构及其与鲁迅的关系为研究重点,台湾学者周行之则侧重政治史的视角,梳理了鲁迅与左联及中共之间的分合,二人于1991年在台北出版了各自的左联研究专著。<sup>⑤</sup>进入90年代后,随着社会思潮的多元化,研究迅速落潮,仅在左联成立的周年纪念活动上有应景式活跃。在2000年左联成立70周年的纪念会上,与会专家皆以“冷清”来形容左联研究的状况,痛感左联研究“人才凋零”,“专门从事‘左联’研究的人越来越少,最有学术能力的学者目前几乎无人以‘左联’为专门的研究课题”。在研究成果方

① 南京大学中文系编:《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60年。

② 丁景唐、瞿光熙编:《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

③ 冯烈、方馨未整理的《冯雪峰外调材料》(上、下),载于《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1期和第2期,两期一共刊载了四五万字,而据编者说明,冯雪峰“文革”时期外调材料总计达50多万字。

④ 具体书名和篇名参见书末所附参考文献。

⑤ 王宏志:《思想激流下的中国命运:鲁迅与“左联”》,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1年;周行之:《鲁迅与“左联”》,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

面,左联会址纪念馆的张小红在写作左联研究综述时备感“伤心”：“写作过程中她查阅了近 20 年的学术期刊,发现关于‘左联’的研究论文非常少……20 年来,公开发表的关于‘左联’的论文不过 30 来篇。进入 90 年代以后,1992 年、1993 年还有一些——这是因为 1990 年纪念‘左联’成立六十周年的余温,可是到了 1995 年以后,关于‘左联’的专门论文就很难找到了。”<sup>①</sup>这一描述基本上是准确的。直到近十年来,左联研究才有重新活跃的趋势,探察视角开始趋于细密,并出现了多部研究专著。如姚辛对左联史料的系统发掘辨析(姚辛的左联研究起步很早,但其《左联史》2006 年才发表),汪纪明对左联组织机构的考辨,孔海珠基于新发现《文报》的左联研究,张小红对左联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研究,左文、陈红旗对左联期刊的研究,朱晓进对左联政治文化的研究,王锡荣对左联成立和组织系统的详细考察,等等。

日本学者对左联研究也有不少贡献。中国左翼文学研究,向来为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之重镇,其中自然涉及左联处甚多;但是专门的左联研究(尤其偏重左联的组织和制度),日本学者似没有太多论及。最值得一提的是,小谷一郎、近藤龙哉、芦田肇等编辑出版了辑刊《左联研究》,前后共出版了 5 辑(1989-1999),在东京左联、北方左联以及左联筹建等方面有精细研究。

左联研究虽已获得重要进展,仍存在有待深入探掘的学术地带。突出的表现集中于两方面。一,目前的研究还大体集中于左联内部,大都未能突破内部研究的视角,未能将左联与广阔的政治环境联系在一起。而大量史料可证,左联是高度政治化的团体,左联自己也反复宣称其并非作家的同业组合,其领导成员及政策的几经调整,皆和共产党的政治活动有直接关系。史家便注意到:“他们(指左联——引按)所形成的一个又一个决议,特别是关于形势的分析和政治任务的规定,几乎全是对中共中央文件的摹写。”<sup>②</sup>然而,对左联与党的引导之间的亲密关系,至今罕见细致梳理。史学界研究此一时段党史被大量使用的若干大型丛书,左联研究由于受文学研究范式

① 祝晓风:《“左联”研究陷入停顿》,《中华读书报》,2000 年 3 月 15 日。按,张小红所查找的“左联”研究论文当指以“左联”为论述核心者,而非指泛泛的 20 世纪 30 年代左翼文学研究。

② 杨奎松:《中国近代通史》第 8 卷《内战与危机(1927-193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207 页。

的制约,利用较少。反而是史学界已有学者使用与左联相关会议档案史料进行政治文化史研究。因为缺乏必要的外部参照系,左联研究缺乏取得突破的支撑,对左联的组织机构和运作方式因此不能获得更深入的认识。二,目前的左联研究对数量巨大的左联回忆资料,缺乏细致的辨伪与考证。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集中出现的左联盟员回忆,由于回忆者年事已高等因素,其中的细节存在大量含混与抵牾,研究者常莫衷一是,但未见太多细致的甄别考辨。正因有上述缺陷,对左联诸问题的探讨常陷入疑团而难获推进。最突出的表现或就是左联的筹建及组织形态至今面目不清。

其实,以上两方面的缺陷彼此关联,其克服亦需齐头并进:将左联置于具体政治史的脉络中考察,不能不大量运用相关左联回忆资料;而具体考辨左联回忆资料的真伪,又不得不广泛采用历史实证文献。本书便致力于以左联的筹建和组织系统为研究中心,在以上方面有所突破。

既有的左联组织和制度研究虽然已有不少成果,但就利用史料的广泛性和发掘的深度来看,尚较为薄弱。对左联组织机构所做的考察,立论还基本限于左联自身。对此一问题做过较专门研究的学者主要有王宏志、周国伟、姚辛、张小红、张大伟、汪纪明、王锡荣等。王宏志曾做长篇论文《“左联”的组织与结构》探讨这一问题,大致理清左联组织结构的轮廓,但所采用的史料主要集中于《左联回忆录》,所采取的也主要是静态剖面式研究,对左联六年间的组织变迁涉及相对较少。因其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对20世纪90年代初期又公开发表的许多左联回忆资料自然也未加利用。周国伟对左联的实证层面也有考证,论文《“左联”组织系统史实考》廓清了许多迷雾,但该文仅约五千字,虽则提纲挈领,所论范围毕竟有限。姚辛是专攻左联研究的学者,几乎对左联的方方面面均有系统研究。作为一名家境贫寒的普通工人,他凭借对左联的热情,数十年自费奔波全国各地寻访左联史料,撰成包括《左联词典》和《左联史》在内的共计数百万字的左联研究著作。<sup>①</sup>虽然令人敬佩,然而也不必讳言,姚辛作为民间学者,其左联研究常常热情有余而专业性略欠,过多的情感判断常掩蔽深入的学理探讨。自然,

---

<sup>①</sup> 对姚辛事迹的概述参见陈苏:《姚辛:生为左联》,《嘉兴日报》,2011年1月28日。工人姚辛对左联的激情,也折射出左联的底层诉求所内蕴的超越时空的精神能量。

姚辛在左联史料整理方面的贡献仍然堪称巨大,由于其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便亲自访问了 90 多位左联盟员,而这批盟员已基本辞世,所以他于 2011 年的去世无疑是左联研究的重大损失。在左联的组织制度史研究方面,姚辛亦有梳理考辨<sup>①</sup>,但还基本限于若干具体史料,而缺少系统性的鉴别和归纳。左联会址纪念馆张小红的《左联与中国共产党》是在政党背景下系统考察左联的专著,也有专门的章节处理左联的组织结构问题<sup>②</sup>,但该著亦属扼要,长于轮廓梳理,而疏于资料钩稽与辨析。以左联的组织结构为研究重点的博士论文目前亦有两篇:一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张大伟的《“左联”文学的组织与传播(1930—1936)》(2005),一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汪纪明的《文学与政治之间:文学社团视野中的左联及其成员》(2010),两篇博士论文均已成书出版。<sup>③</sup>其中张著以传播学和行政管理学的视角切入左联的组织与传播研究,以一章的篇幅梳理左联的组织结构,对左联的内部组织和上级领导机关,条分缕析其功能和变迁。但问题在于面对史料分歧较少辨析,引证史料的来源同样多限于《左联回忆录》。汪著也意识到左联盟员的回忆矛盾重重,于是援引党史资料作为参照,于是开拓了左联研究的视野,其对左联组织结构的考辨因而具有了较强的突破性。但其中仍存在许多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其原因一是该著对左联盟员的回忆相对忽视,二是该著固然注意到了左联的政党特性,但面对面目暧昧的左联组织机构,却忽视中共的组织规章以及社联、剧联等左联兄弟社团的组织规章,而采用殊少政治色彩且诞生于数年前的《创造社会章》作为对比参照,相关论述因而出现局限。王锡荣 2016 年出版的专著《“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对左联筹建及其组织系统做了系统梳理,许多方面都后出转精,但对左联盟员的回忆考辨仍嫌不够,也较少借助必要的政治史料来辅助探讨。<sup>④</sup>

① 参见姚辛:《左联史》,第 2 章第 1—2 节,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 年,第 6—12 页。

② 参见张小红:《左联与中国共产党》,第 2 章第 3 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78—85 页。

③ 分别为张大伟:《“左联”文学的组织与传播》,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 年;汪纪明:《文学与政治之间:文学社团视野中的左联及其成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

④ 王锡荣:《“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

表面来看,左联的筹组和制度研究似乎只是左联研究较为边缘的一部分(毕竟在文学研究中左联更多还是作为一个“文学”团体而存在),实则大不然。这由左联的特殊属性决定,而左联的特殊属性,其实也决定了“左联研究”的特殊性。长期以来,“左联研究”并不能很好地区分自己与宽泛的30年代左翼文学研究的关系,而这一区分,在进入左联研究前,应该首先予以分疏。否则,所谓的左联或左联文学研究,可能与作为社团组织的左联,几乎全无关系。

这主要是由于,左联固然一度是近于“第二党”的组织,但毕竟是在国民政府和租界的管辖范围内活动,左联的政策变迁和具体指令,并不足以规约盟员的全部行为;即是说,盟员对左联并没有人身依附的关系。对鲁迅和茅盾这样成就和知名度较高的少数左联盟员而言,他们在左联组织中享有极高的自由度,左联一般并不会对他们下达具体命令,反而常向他们汇报、请示工作。而对普通左联盟员而言,他们的硬性任务,其实更多是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和飞行集会,至于发表文章、创办刊物,只要不出格,一般也并不干涉。左联盟员所享有的较大活动空间决定了,并不能笼统地把左联盟员的行动统一归入“左联”的范围之内;所谓“左联研究”,也仅应该包含与左联的政策变迁和组织活动等直接相关的内容,而不应该指向左联盟员在左联时期的所有活动。也正因为对“左联研究”的界定存在混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便出现了,一是认为左联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便异常冷清,一则认为左联研究一直是现代文学研究的最大领域。显然,第一种概括更加符合“左联研究”的实情。

倘若划清了“左联研究”的合理界限,则不难明白,左联的组织制度研究,其实是左联研究几乎最基础的环节;而要进入左联的组织制度研究,不能不依赖对政治环境变迁的细密剖析。而既有从政治环境变迁角度对左联所做的考察,更多还限于概要性论述,在考察视阈及阐释上也还均有拓宽与深入的空间。这一缺憾其实也直接导致了对左联文学实践的认识常不能更进一步。

## 二、左联组织史研究的可能性

左联无疑是高度政治化的团体,在20世纪30年代常有“第二党”之称。在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由于上海中共党组织遭受重创,以左联、社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化组织甚至一度担负起部分维系中共组织生命的任务。本来是群众团体的左联在内部设立了党支部,接纳了众多与党组织失去关系的非作家“党员盟员”。1935年,以周扬为核心的左联盟员创建的新文委和1936年胡乔木等文总成员创建的“临委”(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成为上海地区最重要的党组织之一。以上无不揭示出左联的活动与政党活动之间高度的统一性,而这也说明,左联及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左翼文化研究须臾不可偏离对中共政治活动的考察。倘若进行的是左联的组织变迁等制度层面的研究,则更是如此。

因此,对左联的组织研究难免会涉及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20世纪30年代中共在上海活动的档案材料,否则许多问题将难免陷于泥淖。比如,中共在筹创左联之前成立的文化党团、文化工作者支部、第三街道支部、文委等组织或机构,它们的成立时间和彼此关系(甚至名称)至今都众说纷纭。具体到左联问题上来,左联召开的常委或执委会议以及其他各种会议,是否也有相关档案材料可供查证?左联所创办的内部刊物,至今也不能完全看到。比如左联秘书处创办的《秘书处消息》,至今仅赖鲁迅的保存而能见到一期;曾恶化了鲁迅与左联关系的左联后期机关刊物《文学生活》,亦赖鲁迅保存而仅见一期。文总亦然,其机关刊物《文报》,学者孔海珠在档案材料中寻获到3期(2期正刊、1期副刊),其中包含不少有价值的内容,但《文报》仅正刊便至少出了11期。以上刊物因为均系内部出版,对研究处于地下状态的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的组织机构、政策变化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惜乎或已失传,或只能看到极少一部分。这给研究无疑造成了巨大障碍。那么,在相关档案中,是否还能有新的收获呢?

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但问题在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化档案资料目前有多少存世?而存世的又有多少处于解禁可发掘的状态?从现有的

利用了此类资料所撰写的官方成果来看,情况不容乐观。比如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合编的《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1919.5—1937.7)》,其中涉及左联的记事条目甚多,虽则对史料来源多半未注出处,但细察可知,绝大部分都源于左联盟员的回忆,在盟员回忆晦暗不明处,“大事记”也多半晦暗不明;虽然对歧异之处也常有所考证取舍,但明显可见,判断的依据仍然并非确凿的档案材料,以致其中错讹并不少见。而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的《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5—1949.5)》,对左翼文化资料的记事更加含混,甚至有自相矛盾之处。比如对艺术剧社的成立时间,先说成立于1929年9月,不远处又说成立于1929年11月。<sup>①</sup>

众所周知,左联资料整理的最大推动力来自党和国家的支持,甚至“文革”结束后左联盟员纷纷发表回忆文章<sup>②</sup>,其实也是宣传部门推动的结果,其目标并不完全在于保存史料,更在于“拨乱反正”——为被“四人帮”抹黑的三十年代左翼文坛恢复名誉,确立正统左翼文学的合法地位。当然,这也是国家行为和左联盟员意志的一次完美结合。为了宣传左联,同时也为了搜集和整理左联资料,并推动相关研究,国家还专门建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1990年3月2日正式开放)。左联会址纪念馆已经出版了多种左联资料集和研究论文集,每逢左联成立整十周年便举行大型纪念和研讨活动。因此,左联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可以推想已经进行得十分深入,想从国家档案中获取全新的左联相关资料,将极其困难。其实,早在“文革”社会失序时期,各地革命组织纷纷挖掘三十年代左翼文坛“黑线”资料,倘若档案资料中有任何蛛丝马迹,自然不会被放过。而我们看到,造反派组织深挖文坛“黑线”时固然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并对相关当事人进行了数量密集的“外调”,但几乎很少见到它们利用未公开的档案资料。这可能并不能说明它们未曾利用,而只能说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文化档案中,其实几乎没有左联相关资料。

又如在“文革”结束后,许多左联盟员重新成为国家领导人,享有较高地

<sup>①</sup> 参见该书第218页、第224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89年。

<sup>②</sup> 1982年出版的《左联回忆录》便是这批文章最大规模的一次结集。

位,当他们撰写回忆录时,许多人也有条件调用档案材料,但事实上也并未见任何人使用了这一“权利”。在他们的回忆录中,仍然充满了难以查证的片段。夏衍的《懒寻旧梦录》对左联有详尽回忆,然而当面对左联成立大会的参加人员这一问题时,他引用(并加以驳斥)了的档案资料竟然来自国民党方面。<sup>①</sup>这一状况,完全由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及共产党在上海所处的不断恶化的地下境况所决定。环境的恶劣,使得20世纪30年代许多时段的上海地区中共革命档案材料,几乎损失殆尽。试翻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编写的大型丛书《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其中关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委乃至中共中央的组织机构及任职人员的记录,与另一部由学者王健英独立编撰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相比,尤其在任职人员方面,常常判若天渊。而身份更为民间的后者,在不少情况下记述反而更为细致、准确。<sup>②</sup>如果具体到上海各区,则资料匮乏的情形更为严重。如左翼文人最为集中的上海市闸北区,20世纪30年代中共在该区的区委情况,也多无准确资料可稽。据《闸北区志》载,1933年任区委书记的先后有小周和老王,显然已经失考。<sup>③</sup>其他区的区委书记中,也多有小曾、老师、老曹等人名。<sup>④</sup>

笔者此前一直以为,目前从事左联组织和制度史研究的时机尚不成熟,需等待档案开放到一定程度方可进行。然而随着阅读材料的增多,此一观点逐渐动摇。正如上所述,根据各种情形均足以推断,现存的档案资料中不会包含太多与左联的组织和制度建设直接相关的内容,即便有,一则不知需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才能获得,二则也难以期待能够对相关研究有关键性影响。所以,安于等待绝非目前从事左联研究所该取的态度。更何况,现存的左联相关资料,其实已经足以支撑研究。

① 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04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二著对资料来源几乎都未注明出处,但后者的初版则有注释说明,显示包含大量回忆资料。

③ 上海市闸北区志编纂委员会编:《闸北区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595页。

④ 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第1247页。

确实,现存左联资料多系盟员在“文革”后的回忆,由于盟员年事已高,同时也由于参加左联具有极强的政治荣誉性,而相关评判标准仍然具有意识形态色彩<sup>①</sup>,相关回忆难免有含糊不清或彼此矛盾之处,甚至难免存有修饰或伪装。但是,如果细加统计,可知左联盟员直接针对左联的回忆资料已经远超百万字,其他对左联有所涉及的回忆更不可胜数。这批资料以其内容的烦琐和不确定性使人生畏,然而倘若能妥善利用,并参照以相关历史档案材料,无疑也是一座富矿。一个看似不可靠的细节可能无用,但当它们堆积到一起,历史的脉络往往就浮现了出来。

---

① 最突出的表现或是对鲁迅的态度:反鲁迅是“文革”期间一项极严重的罪名,同时也是20世纪30年代“文艺黑线”的主要罪状之一;而在否定了“文革”之后,左联盟员在回忆中仍谨慎地避免触犯鲁迅,并以表达自己对鲁迅的拥护和爱戴为重要内容,而实际上,他们所表达的态度与他们在左联时期的多半并不一致。当然,这一问题较复杂,不能完全归因于意识形态的规训性。

## 第一章 左联筹建的政治宣传动因

左联的创建,常被视作中共在文艺领域施行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起码也标志着左翼进步力量实现了大结合。<sup>①</sup>这一论断自然有所依据。因为左联系经由论争而创建,是论争中对立的数派力量舍弃分歧联合而成,而中共在其中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安抚并争取党外力量,消弭其顾虑。然而一个悖论性的历史境况是,其时极左思潮正在党内居统治地位。何以在此时竟能产生一个统一战线或说“大结合”的组织呢?

这一“悖论”自然是以后才逐渐兴起的“统一战线”概念来理解历史的结果,其中涉及特定语境下革命经验的生成、转换或移置。<sup>②</sup>那么,左联即

---

① 左联统一战线组织的观点,最初应当是来自冯雪峰1946年初发表的文章《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连载于《中原·文艺杂志·希望·文哨联合特刊》第1卷第1期至第3期,同年6月由上海作家书屋出版单行本)。茅盾随即撰文对这一观点表达了非议,认为左联初期并未采取统一战线政策。参见茅盾:《也是漫谈而已》,《文联》第1卷第4期,1946年2月25日,第4—5页。新中国初期的文学史著大体沿袭了冯雪峰的观点,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等。在这些论述中,党作为统战主体,革命文学派作家基本上和鲁迅处在相同的被统战等级序列中。

② 对左联统一战线性质论说起源的考察,参见吴述桥:《“第三种人”论争与“左联”组织理论的转向——从“左联”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问题谈起》,《中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2期。

便不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又是否可算是左翼大结合的组织呢？本章将深入左联创办前后中共宣传政策的变动，探讨上述问题。

## 一、批判“假马克思主义”——左联筹建的直接动因

通行历史叙事常以“失败”来指称大革命的结果。这自然是以特定的史观为观察视角的，自有其合理性。不过也需要注意的是，“革命”作为贯穿整个19—20世纪中叶、作为政治合法性重要来源的行动，其代表进步与正义的功能，具有相当广泛的意识形态跨越性；与之相对立的“反革命”（或“反动”），在此一时段的多数政治语境下，都是个严厉的判断。

具体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国共两党虽然分裂，但国民党依然打着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旗号，因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在此情形下，革命号召变得比从前艰难得多。革命，固然具有风靡人心的号召力，然而谁才是真正的革命代表？<sup>①</sup>中共对此也有明确意识。比如对军阀战争，中共虽然定性它们是“争夺反革命领导权的斗争”，然而也意识到资产阶级“一定要宣传这次战争是‘革命的’战争”。其危害是显然的：“这种宣传特别在封建阶级统治的地域中……很容易助长群众对资产阶级的幻想。这种危险，可以使群众不自觉的走到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sup>②</sup>

而更严重的情形还在于，共产主义阵营本身此时也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在欧洲，随着第二国际的分裂与第三国际的建立，以苏俄共产主义者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以欧洲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决裂。欧洲社会民主党蓬勃发展，宣扬劳资调和等改良主义主张，工农应和者无数；在英国，作为社会民主党一支的工党甚至取得了执政地位。而在中国，近似于社会民主党的势力也正跃跃欲试，第三党（邓演达、宋庆龄主导）、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主导）、新生命派（陶希圣主导）纷纷建立，批判现政权，甚至前往

① 依照政治学光谱，国民党很难称得上是右翼政党，而是具有一定底层诉求的左翼政党（尤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当然，其保守甚至反动倾向也十分浓厚。

② 《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军阀战争的形势与我们党的任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72页。